

《无名的裘德》中裘德的伦理选择与身份建构

Jude's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ude the Obscure*

艾士薇 (Ai Shiwei)

内容摘要：《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叙述裘德从农村进入城市追求理想的伦理选择和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身份转变过程。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要观点，人生道路就是不断建构新的伦理身份和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裘德试图通过自学成为大学生或从事圣职以建构其跨阶层的伦理身份，通过他与追求自由的淑的婚姻以实现其自由人的伦理身份，都因不符合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理环境而遭遇失败。裘德的伦理选择既是对当时腐朽教育体制和虚伪婚姻制度的挑战，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压制人才的批判。哈代通过裘德伦理选择失败事实的叙述和评说，让读者从中获得教诲，批判性地认识维多利亚晚期社会体系的本质，并为自己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无名的裘德》；哈代；伦理选择；伦理身份；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艾士薇，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欧洲文学与文化研究。

Title: Jude's Ethical Choi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Jude the Obscure*

Abstract: *Jude the Obscure*, the last full-length novel written by Thomas Hardy, describes Jude's ethical choice to move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in pursuit of his ideal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farmer to industrial worker. According to the main concept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path of life is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nstructing new ethical identities and making ethical choices. Jude's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ross-class ethical identity through self-education, aspiring to become a university student or enter the priesthood, and his endeavor to establish an ethical identity as a free man through marriage with Sue, who ardently pursues freedom, were ultimately unsuccessful due to their incongruity with the prevailing ethical milieu of late Victorian society. Jude's ethical choices pose a challenge to the decadent education system and hypocritical marriage system of that era, while also serving as a critiqu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s suppression of talent. Through Hardy's narration and commentary on Jude's failed ethical decision,

readers can gain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late Victorian social system and find guidance for making appropriate ethical choices in their own lives.

Keywords: *Jude the Obscure*; Thomas Hardy;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Author: AI Shiwe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icevy@whu.edu.cn).

哈代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 1895, 后文简称《裘德》）出版后，遭到批评界的严厉抨击，被指责为“一本淫荡的小说”和“最伤风败俗的作品之一”（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234）。这体现的是当时维多利亚社会末期新旧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之间的激烈斗争。20世纪70年代后，《裘德》成为各种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试验场。西方评论者尤为关注作品中的女性与婚姻主题，如米歇尔·索普（Michael Thorpe）强调淑在作品中的重要性，认为她“不是‘新女性’的变体，而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形式，她与男性在智力和性方面的关系都是‘新的’”（Thorpe 67），甚至将《无名的裘德》更名为《无名的淑》（“Sue the Obscure”）。威廉·R·高姿（William R. Goetz）认为，婚姻主题“不只是社会主题，还是一种制度，它的形式与哈代试图创作的小说形式吻合”（Goetz 192）。中国评论界重在探讨《裘德》的社会性与伦理问题，前者从社会历史维度探讨《裘德》，指出“小说描写的教育主体触及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痛处，但是使资本主义最难容忍的却是小说中宣扬的违反传统道德和宗教信条的婚姻观念”（《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248）；后者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探讨《裘德》，聚焦家庭伦理与婚姻问题，强调人物的悲剧命运“既是当时传统家庭伦理的作用结果，也是他们处理家庭伦理关系不当的致命惩罚”（刘茂生 陈琴 42）。

在哈代研究中，我们不能忽视《裘德》是哈代“第一次对现代工人阶级悲惨命运所做的艺术表现，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教育、婚姻、道德、宗教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的沉痛思考”（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237）。哈代本人也强调整部作品“首先涉及一个穷学生为获得大学学位而付出的努力，其次才是两段不幸婚姻的悲剧性问题”（Millgate 101）。不论是接受教育的努力，还是因爱情导致的悲剧，《裘德》都是一部涉及青年工人无产者成长的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生道路就是不断建构新的伦理身份和做出伦理选择的过程。“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本文将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术语，探讨裘德在无比复杂的伦理环境中如何通

过一次次伦理选择建构自己新的伦理身份的过程。

一、裘德跨阶层伦理身份的建构

人类在自然选择后从形式上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进入伦理选择阶段。¹ 伦理选择是“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对如何做人的选择，也是对人的身份的建构和确认。伦理选择活动往往是由人的身份决定的，不同身份的人往往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也建构新的身份”（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 77）。裘德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目的在于建构并确认新的跨越阶层的伦理身份。

年少的裘德在玛丽格伦生活期间，主要帮他老姑太太经营的面包店送货，偶尔打点儿零工，以维持生计。裘德本来可以安于世事，未来继承老姑太太的面包店，像大多数普通的玛丽格伦人一样平凡地生活。但是，他受到了老师费劳孙的感召，有了新的人生理想，决心开始新的人生选择。他的计划是先取得大学毕业的身份，然后再到教会从事圣职。他选择回到基督寺生活，是因为那里靠近大学，能够感受大学的崇高。自此以后，基督寺便像灯塔一般照亮了裘德生活，成为他建构自己基督寺大学生伦理身份的重要因素。“伦理身份有多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63-264）。裘德想要转变的正是以职业为基础的身份，他不甘于平庸，不想一辈子留在玛丽格伦，希望通过自学跨越社会阶层，开始大学生的生活。他的这种选择，开启了其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转变。

为了建构新的伦理身份，裘德做出的第一个伦理选择就是离开玛丽格伦前往基督寺。为了能在基督寺生存并实现学业上的目标，裘德选择了建筑事业。他先向“只会做低贱活儿的石匠”学习，随后跟一位教堂建筑师学教堂的石工活，但从未忘记劳作“只是一种手段，靠它维持一时的生活，好来准备他自己以为更合乎个人志趣的伟大事业”（43）²。当裘德的石工技术越来越高超，并接受工厂主雇佣时，他已经实现了“从作为一个农民阶级的代表向一个城市工人的转变”（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237）。但裘德深知这一伦理身份的转变只是过渡状态，并非其最终目标，他仍需努力实现大学生甚至是知识分子身份，因而，必须前往基督寺。

当裘德来到基督寺，他生活的伦理环境发生了巨大转变。在他心中，基督寺“是思想活动和宗教活动惟一无二的中心——是咱们这一国里知识食粮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2 本文《无名的裘德》引文均来自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张若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和精神食粮的仓库”（159）。他自信地认为，只要工作和努力，就能在基督寺拥有一席之地。但是，无论裘德如何奋斗，都无法改变他工人身份的事实。裘德的同乡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那种地方不是给你这样的人预备的——那只是给那些有钱的人预备的”（159）。作为工人，裘德无法在劳作一天后集中精力学习；作为自学者，他也无法完全弄懂艰深的书本内容。求学的强烈欲望促使裘德鼓起勇气给大学院长们写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他的信如石沉大海，遭到长久的无视后，裘德终于收到了一位院长的回信。与裘德的期望相反，院长并非鼓励他勇往直前，而是说他“既身为工人，则谨守本分，安于旧业，较见异思迁，别作他图者，于世路之成功上进，自有更多之机会”（165）。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指出，“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让人们得到思想浸润且不受束缚，“文化人是平等的真正使徒”（阿诺德 34）。院长回信的意图不是为了鼓励裘德求学上进，更不是为了消除阶级偏见和把知识传给普天下的所有人，而是拒绝平民入学，固化阶级差异。他希望维持英国传统绅士教育的纯粹性，保护有产者受教育的特权，因此警告裘德按工人身份行事，切莫妄图跨越阶层和奢求进入大学。

在基督寺向裘德关闭大门求学无望时，他试图借道宗教改变工人无产者的身份，实现跨阶层的伦理身份建构。裘德内心清楚，他研究神学，梦想做主教，不过是他野心的一部分。哈代在小说中直白地评价裘德的选择说，只是出于“飞黄腾达的野心，不过披着一层宗教的外衣就是了”（180）。裘德自己也意识到，他的计划一开始“还含有一些高尚的动机，但是到后来，却恐怕完全变成了往上爬的野心了”（180-181）。为了实现目标，裘德的阅读策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最初没有直接阅读《圣经》，而是阅读神学学者和神学家、主教的阐释著作。但是在淑看来，长老们或主教们做出的注解，即《新约》“每章前面的提要，都把那些热烈情诗的真意歪曲了”，伟大热烈诗歌里表现的人与人的欢乐与自然之爱，被他们“用宗教的抽象话把它涂饰起来”（216）。除了神学家或大主教曲解《圣经》之外，裘德同时代的神职人员也罔顾信仰，将金钱看得重于一切。裘德曾被维赛司一位由基督寺培养的音乐家所创作的赞美诗感动，于是产生了拜访他的念头。然而，当音乐家发现裘德只是穷人，与体面衣着并不相符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音乐家似乎并不在乎裘德对自己作品的敬意，而是不断抱怨没钱的烦恼，向他散发即将开业的广告货品目录。

由此可见，文化与文化人、教育与大学、宗教与圣职的本质，在物欲横流、阶级壁垒高耸的维多利亚时代发生了改变，早已不是原本追求平等、教化民众或拯救世人的教育与宗教，而成为了上层社会的特权且趋于保守，宗教则与金钱同谋。在《裘德》之前，哈代倾向于从启蒙主义角度思考问题，认为威

塞克斯农民的悲惨命运与落后意识主要是因为缺乏教育造成的。但是在《裘德》里，哈代深刻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与大学只是有产者的特权。为了维护这份特权，特权阶层将众多平民子弟关在大学门外，因此底层民众缺乏的不只是教育，还缺乏接受教育的基本权益。从表面上看，裘德想到基督寺接受教育，是为了建构大学生的伦理身份，或者通过考试鉴定，获取神职人员的伦理身份。实际上，他选择上大学和当主教，挑战的是当时社会固有的阶级秩序，这既是对阶级鸿沟的逾越，也是对自己建构新身份努力。

二、裘德自由人伦理身份的选择

裘德在追求人生理想的伦理选择过程中，既经历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选择和转换，也经历了从传统婚姻到自由婚姻的不同婚姻角色的转换。在裘德与艾拉白拉、淑的两段婚恋选择中，裘德的自由选择与伦理选择交错出现，其伦理身份也在不断更迭。在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后、在淑的思想启发下，裘德逐渐认清了维多利亚时代婚姻制度的腐朽本质，进而抵制婚姻，试图建构其追求自由的伦理身份。

青年裘德本打算通过自学去基督寺读书，却因有一天在回家路上被艾拉白拉有意挑逗而改变了人生规划。显然，他的伦理选择脱离了理性的引导，注意力从学习古典文学的梦想转移到身材丰腴的艾拉白拉身上。裘德受原欲驱动，为了自由选择，放弃了最初的大学生身份的建构。所谓自由选择“是本能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兽性因子发挥作用的结果”（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21）。裘德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下与艾拉白拉尝试禁果，放弃学业上的选择深陷肉欲之中。这是裘德在兽性因子主导下做出的错误选择，所以裘德尽管当时也意识到艾拉白拉并无可取之处，但仍选择与她结婚。婚后，裘德的伦理身份从积极向上、努力学习的单身汉变成了为养家糊口、放弃学术的丈夫。他开始反思婚姻制度，为什么人要因一时本能而放弃一直以来的规划、放弃进步和为社会做贡献的可能，他察觉到“这种仪式，一定有问题”（83）。错误选择的结果必然导致婚姻的失败。艾拉白拉发现裘德无法满足其物欲，便选择了离开，在澳洲找到新欢。裘德认清了这场婚姻的本质，毫不犹豫地选择结束了婚姻。

如果说裘德同艾拉白拉的婚姻是出于兽性因子主导的本能，而他对淑的爱情则是在人性因子主导下的理性引领。裘德结束了同艾拉白拉的婚姻后，决定离开玛丽格伦前往基督寺时，继续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建构。抵达基督寺后，裘德见到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影响他的身份建构的恋情。在哈代的笔下，淑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没有凡心的神和没有肉体的精灵，她的智力出类拔萃。裘德认为，淑能够帮助他建构新的身份以实现人生目标，让他获得心灵的共鸣和生活的安慰。两人相处与相恋的过程中，裘德并没受到兽性因子的驱使，仅

选择做对方的情人，而是保持理性，追求精神上的伴侣，不让自己的行为逾越道德。他们在分别结束各自的婚姻之前，都能在道德规范之路建构精神恋人的身份，互相鼓励追求人生的目标。

伦理选择需符合伦理环境或语境的道德要求，但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选择的标准，即一个人按照自己选择的标准进行选择的主观标准。一种是环境和语境标准，即自我选择应符合环境和语境的客观标准”（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21）。裘德与淑对是否结婚的伦理选择便是两种道德标准博弈的结果。淑表达了对婚姻的恐惧，认为婚姻不过是铁一般的契约，最终会磨灭彼此的柔情，甚至认为裘德若只按照“盖有政府印信的文件统一来爱”，她也“按照政府的许可”接受裘德的爱，“太可怕、太腌臢、太叫人恶心了”（367）。我们不能说淑的选择是非理性的，只是她的伦理选择是基于自我选择的标准，是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判断做出自由选择。裘德评价淑“完全是一个虚幻空灵、没有肉体的人（……）几乎丝毫没有兽类的情欲：所以你做这种事情，能够听从理性”（368-369）。

同淑的自我选择相比，裘德的选择更看重当时的环境和语境标准，试图按照维多利亚晚期的伦理规则赋予他同淑的这份感情的合法性。在办理结婚手续的过程中，对于选择遵循何时的环境或语境的伦理标准时，裘德开始了伦理思考。根据小说的描述，英国有两种合法的婚姻仪式：一是在监督登记局签字画押组建家庭；一是在教堂里向上帝承诺结为夫妻。在裘德和淑的想像里，监督登记局一定是安静、温馨、美好的，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混乱和充满暴力的景象：满脸凶气的大兵、满脸愁容和鼻青脸肿的怀有身孕的新娘、醉醺醺的女人带着刚从监狱出来的男人。这些男女并非为两情相悦而组建家庭，而只是为那一纸契约。看见这种情景，裘德都不由地感慨说：“那个地方太丑恶了：它叫你心灰意冷，也同样叫我心灰意冷”（406）。随后，他们又在教堂里看到了一对正在举办婚礼的中产阶级男女，婚礼好看、有趣，但新娘的誓词却念得机械，新娘似乎并不理解这些字句的意义，如同古代即将牺牲的小牛。这一场景让裘德和淑分别想到了他们的第一场婚姻，认识到这种契约式婚姻或许对很多人适用，但对他们的爱情追求毫无益处。他们的婚姻选择显然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超越当时的世俗观念。淑一针见血地指出：“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那现在这一对儿的后人，在行动和感觉方面，要比咱们现在还觉得别扭。他们要比咱们现在还清楚地看到扰攘的人群都是些，跟我们一样的有形之体，肮脏龌龊地生长繁殖，他们那时候就要不在生儿养女了”（409）。可以说，他们的选择在思想观念方面超越当时的人 50 甚至 100 年，意识到永恒誓言的危险性和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腐朽本质，他们深切认识到男女皆为虚伪婚姻的受害者。正是他们的先进观念，裘德和淑选择拒绝婚姻。通过拒绝婚姻，裘德最终建构了自己自由人的伦理身

份。他希望能作为一位自由人爱着同为自由人的淑，而不是像维多利亚时代众多的家庭，将婚姻变成契约，让妻子成为附属品。裘德的伦理选择让他和淑成为了彼此相爱且平等、独立的自由人。

哈代在给好友的信中曾谈到裘德与淑的爱情：“尽管她有了孩子，她与裘德亲昵从没有超出偶然的程度，即使在他们一起生活（……）除了快到结尾时，他们各人有自己的房间。（……）他从来没有真正随心所欲的占有过她”（Hardy 272）。哈代根据超前的婚恋观念塑造裘德和淑这对自由人的形象，描写他们自由的婚恋选择和自由人身份建构，即使在今天也能带来启发。

三、维多利亚晚期伦理环境与裘德伦理选择的冲突

裘德追求社会上的跨阶层伦理身份以及婚恋上自由人的伦理身份，代表了当时的工人无产者追求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在当时的伦理环境里，裘德艰难的伦理选择注定了失败。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7），就会发现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伦理环境，是裘德决定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重要因素。

伦理环境指“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而对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则要“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客观的伦理阐释”（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56）。裘德所处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了现代工业社会。无数农民变成了农业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在现代潮流的推动下，大量农民从农村汇聚到城市，传统的贵族乡绅家长制转变为城市中冷漠的雇佣关系。尽管裘德的身份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现代工人，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但他只能靠工厂雇佣和出售劳动力谋生。裘德认识到要实现美好的理想，只能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和做出创造条件接受大学教育的选择，企图建构自己大学生的身份。

但是，英国的教育环境决定了他无法建构自己的大学生身份。19世纪的英国教育主要有两种体系：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大众教育是为了让劳动者成为合格的劳动力所设置的基础教育；精英教育的目的则是“为教俗两界及军队等输送合格官吏”，但“受教育的权利一直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精英教育旨在培养绅士素质”且“收费昂贵”（钱乘旦 292）。精英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就是学习古典语言。裘德如果想要进入大学或从事圣职，就必须学习古希腊语或拉丁语。通过自学，裘德意识到他“所要学的那种文字的文法书，基本上要包括一种密码特性的规律、成方或者线索”（34），语言的密码特性成了隔绝了平民与有产阶级的天然屏障。因此，裘德的自学不只是对个人学习能力的考验，更是对财富造成的阶级鸿沟的跨越，而这在维多利亚

时代是不被允许的。裘德被大学拒之门外并非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强以及知识不够丰富，而是在维多利亚晚期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的差异是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消除的，当时服务于上层社会的教育环境是难以改变的。

英国的宗教环境也不允许裘德建构自己的牧师身份。裘德无法在英国的教育体制下实现人生理想，于是转而谋求圣职，以建构新的伦理身份。裘德企图建构牧师身份的选择也是当时伦理环境的产物。19世纪英国仍是一个虔诚的国度，尽管教会内部的腐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宗教带了很大冲击，但人们相信国家的繁荣、自由和稳定都源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在英国，做牧师是大多数青年学人的职业选择。因此，裘德选择圣职不仅能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而且能得到上层阶级的认可，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圣职是精英学生的主要选择，而作为一位现代工人，裘德即使具备同精英大学生一样的能力和知识，也是不被允许进入这一职业的。

在婚姻爱情方面，英国的宗教道德环境也不允许裘德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的婚姻理想。对裘德来说，无论是进大学建构大学生的伦理身份，还是谋求圣职选择宗教道路，裘德的选择都失败了。裘德发现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和具备了可以超越大学生的知识，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产业工人的身份，于是回到现实之路，希望在同淑的恋爱中实现自己的婚姻理想。在经历了同艾拉白拉建立在情欲基础之上的失败婚姻之后，裘德转而选择追求以共同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在裘德眼里，淑是“一个没有凡心的仙女”和“游戏人间的精灵”（505）。她天真可爱，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讨厌任何肉体之爱，把两性之爱完全看成是人的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裘德对爱情的追求同她一样，反对契约式婚姻，于是她选择离开丈夫费劳孙而同裘德生活在一起。她认为，若法律法令让人们苦恼，人们就完全没有必要遵守它，何况契约是人定的，也一定能取消它。淑的丈夫费劳孙认为，裘德和淑的爱情里是异乎寻常的亲密或同情，不含任何粗俗的成分，“他们最大的愿望只是要在一块儿，两个互相领略彼此的感情、彼此的幻想和彼此的愿望”（331）。他们的爱既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也是雪莱式的心灵相通之爱。

裘德和淑的婚姻选择是对传统道德、宗教和国家法律保护的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挑战，但是在当时宗教道德环境中是不被允许的。尽管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共同选择了自由婚姻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他们无法脱离现实环境，无法打破宗教道德的桎梏。最后，淑选择了向现实环境屈服，裘德也身心俱疲地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在哈代的小说中，裘德建构跨阶层伦理身份和自由人伦理身份的努力失败了，上演了一出伦理选择的悲剧。为了实现人生理想，裘德和淑怀抱建构新的伦理身份的理想，做过多种伦理选择的尝试，但最后他们都失败了。哈代通过解剖裘德和淑的伦理选择的叙事范例，描述了他们建构新的伦理身份努力，“在被教会和资产阶级视为不道德的人和事中寻找美和善”（聂珍钊，《文

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3)。裘德和淑失败了，但是他们让读者们批判性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残酷、教育体制的虚伪和婚姻制度的伪善，为我们借助文学认识历史和反思当今社会以及在复杂的伦理环境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提供启示。

Work Cited

-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8年。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translated by Han Minzh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Goetz, William R.. "The Felicity and Infelicity of Marriage in the *Jude the Obscure*."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2 (1983): 189-213.
- Hardy, Florence Emily. *The Life of Thomas Hardy 1814-1920*,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 Co Ltd., 1962.
-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张若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Hardy, Thomas. *Jude The Obscure*, translated by Zhang Ruog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 刘茂生、陈琴：“《无名的裘德》中家庭伦理解读”，《世界文学评论》1（2010）：39-42。
[Liu Maosheng and Chen Qin. "The Family Ethics in *Jude the Obscure*." *World Literature Review* 1 (2010): 39-42.]
- Millgate, Michael. *Thomas Hardy Selected Lett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 聂珍钊：“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外国文学研究》6（2022）：15-25。
[Nie Zhenzhao. "Analyzing the Implications of Ethical Selection and Ethical Choic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22): 15-25.]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 *Thomas Hardy: A Study of His Novels*.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1992.]
-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92+205-206。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 钱乘旦编：《英国通史》第5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Qian Chengdan, ed. *A History of England* Vol. 5.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Thorpe, Michael. "Sue the Obscure: Hardy's Female Readers." *The Thomas Hardy Journal* 3 (1995): 66-77.